

DOI:10.3969/j.issn.1674-8131.2023.04.007

税收竞争对地区经济韧性的影响与机制研究

——来自 14 城市群 183 城市的经验证据

田时中,陈浩鹏

(安徽大学 经济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1)

摘要:地方政府降低实际税负的税收竞争可以促进经济增长、要素流入、产业集聚、技术创新以及产业结构升级,进而提高地区经济韧性,但其带来的这一系列问题也可能加剧经济波动,阻碍地区经济韧性提升。以“抵抗力—恢复与适应力—转型力”三维评价指标体系测度城市经济韧性,采用 2005—2019 年 14 个城市群 183 个城市面板数据的分析发现:14 个城市群的经济韧性均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但东部地区的增长速度明显快于中西部地区,导致城市群之间经济韧性差距趋于扩大;地方政府税收竞争显著促进了本地经济韧性提升,并存在吸引要素流入、促进产业多样化、提高创新能力 3 条影响路径;税收竞争的经济韧性提升效应随着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而增强,并表现出从东到西逐渐减弱的区域异质性,但税收竞争力度过大无益于经济韧性的提升。因此,应理性对待和有效发挥地方政府竞争的激励效应,通过完善绩效考核机制改善政府行为,使地方政府的税收竞争保持在合理的区间内,并积极构建更具韧性的经济和社会系统。

关键词:税收竞争;经济韧性;城市群;要素流动;产业多样化;创新能力;产业结构升级

中图分类号:F812.42;F2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131(2023)04-0092-17

引用格式:田时中,陈浩鹏. 税收竞争对地区经济韧性的影响与机制研究——来自 14 城市群 183 城市的经验证据[J]. 西部论坛,2023,33(4):92-108.

TIAN Shi-zhong, CHEN Hao-peng. The impact and mechanisms of tax competition on regional economic resilience: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183 cities in 14 urban agglomerations[J]. West Forum, 2023, 33(4):92-108.

一、引言

在新发展阶段,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同时还应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以

* 收稿日期:2023-05-15;修回日期:2023-07-0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22BJY106)

作者简介:田时中(1984),男,安徽岳西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财税政策与绿色发展研究;E-mail:250312634@qq.com。陈浩鹏(1999),男,江西莲花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财税理论与政策研究。

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建设强大而有韧性的国民经济循环体系是实现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内在要求,持续提升经济韧性已成为各地提高发展质量的重要关注点和着力点。近年来,学界对经济韧性的研究也呈现爆发式增长态势,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原本为物理学概念的“韧性”最早被 Reggiani 等(2002)引入空间经济学的研究范畴^[1],Martin(2010)从抵抗力、恢复力、适应力、转型力四个维度对经济韧性进行定义,认为经济韧性是指经济体在遭受外部冲击过程中通过调整经济结构与增长方式实现经济复苏,并逐步形成新的发展模式和路径的能力^[2],该定义被目前多数学者所采纳。经济韧性决定了区域经济系统能否在外部环境日益复杂的前提下维持竞争优势,避免经济“硬着陆”,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在现实经济中,一个地区的经济韧性受到内部和外部多种因素的影响,因而深入研究影响经济韧性的各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对于采取积极措施有效提高各地经济韧性具有重要意义。

已有文献对影响地区经济韧性的因素从多角度进行了广泛研究。孙久文等(2017)认为影响经济韧性的因素主要是产业结构、社会资本、政策制度、社会环境等^[3];国内相关文献通过经验分析发现:产业多样化、经济集聚、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技术创新、数字经济等因素共同推动了地区经济韧性的提升(徐圆等,2019;赵春燕等,2021;张跃胜等,2022;程广斌等,2022;朱金鹤等,2021)^[4-8]。在政府行为方面,已有文献则主要针对国家的区域发展政策展开分析,比如,国家级经济开发区建设、撤县设区、创新型城市试点等产生了增强城市经济韧性的政策效应(赵春燕等,2021;卢现祥等,2023;常哲仁等,2023)^{[5][9-10]},但缺少从地方政府之间关系角度的深入探讨。事实上,在中国式财政分权制度下,地方政府以绩效考核为标尺的竞争普遍存在(周业安等,2009)^[11],地方政府的竞争行为也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由于地方政府具有一定税收自主权,而税收政策又是宏观调控的主要工具之一,因而税收竞争成为地方政府竞争的主要手段和表现。无论是“为增长而竞争”,还是“为创新而竞争”“为生态环境而竞争”,税收优惠政策都是地方政府激励经济主体行为、释放经济发展活力的重要工具。那么,税收竞争对地区经济韧性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税收竞争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复杂而多方面的。已有研究发现:一方面税收竞争有利于地区经济发展,不仅可以促进经济增长(李涛等,2011;张福进等,2014)^[12-13],还能够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王文甫等,2022)^[14]、优化产业结构(孔令池等,2017;肖叶等,2018;唐飞鹏等,2020)^[15-17],并对要素流入和技术创新产生积极影响(王凤荣等,2015;王欣亮等,2021;蒋仁爱等,2022)^[18-20]。另一方面,税收竞争也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比如,造成地方投资过热、重复建设、公共品供给扭曲等问题(周业安等,2009)^[10],导致要素单向流动加剧、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地方财政支出扭曲以及产业结构趋同等资源配置效率低下问题(于海峰,2008)^[21],并可能阻碍绿色经济发展(李子豪等,2018)^[22]。可见,税收竞争可以促进经济增长、要素流入、产业集聚、技术创新以及产业结构升级,进而提高地区经济韧性,但其带来的这一系列问题也会加剧经济波动,阻碍地区经济韧性的提升。因而在经济实践中,税收竞争对经济韧性带来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但现有文献缺乏对两者关系的深入探究,尤其缺少相关经验证据。有鉴于此,本文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地方政府加大税收竞争力度会对本地区经济韧性产生怎样的影响以及可能存在的影响路径和异质性,并以我国 14 个城市群 183 个城市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

相比已有文献,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在于:一是通过建立“抵抗力—恢复与适应力—转型力”三维多指标评价体系,对 2005—2019 年 14 个城市群经济韧性的时空演变趋势进行了初步分析;二是探讨了税收竞争通过影响要素流动、产业发展和创新能力 3 条路径作用于地区经济韧性的机制以及由产业升级、税收竞争力度和区位条件导致的异质性影响,拓展和深化了地方政府竞争的经济效应研究和经济韧性的影响因素研究,有助于正确认识地方政府竞争对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三是通过实证检验为税

收竞争对地区经济韧性提升的促进效应提供了经验证据,并为各地在经济实践中进一步提升经济韧性、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借鉴和启示。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1. 税收竞争对地区经济韧性的影响

税收竞争是地方政府吸引要素流入、优化资源配置、促进产业转型、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我国税率由中央统一规定,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地方政府往往通过税收优惠、降低税收征管力度、财政补贴、低价出让土地等方式进行税收竞争,最终降低本地的实际税负水平。基于此,本文进行如下设定:地区实际税负越低,则本地政府的税收竞争力度越大。地方政府降低实际税负,并不意味着税收的减少,因为可以培育税源、扩大税基,形成“放水养鱼”“水多鱼多”的良性循环。此外,在结构性减税的压力下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效率得以改善(管治华等,2016)^[23],地方政府还会通过非税收入、发行公债、土地财政等方式保持足够财力进行公共投资(唐飞鹏等,2020)^[17],由此带来的财政激励效应能够提高政府运行效率,改善地区投资环境,进而为推动地区经济转型奠定良好基础。

在经济衰退期,合理的税收竞争能够刺激内需、拉动投资、提振市场信心,从供需两侧为地区经济注入活力。降低实际税负能够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促使企业将更多资金用于生产性投资,确保生产活动的持续进行。实际税负的降低也使得企业能以更低的价格销售商品,从而扩大内需,缓解企业存货积压,加快企业资金回笼。此外,实际税负的降低还能够促使企业扩大用工规模,提升地区就业质量(王智炬等,2020)^[24]。因此,在“稳就业”与“稳投资”的拉动下,税收竞争可以使地区经济在面临重大危机时具备更强的韧性。当经济开始复苏时,随着工作目标从经济规模增长向经济质量提升转变,地方政府根据自身发展目标,通过税收政策激励重点产业和企业发展,引导企业投资决策行为,弥补市场不足,进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调整产业结构(孔令池等,2017)^[15]。产业结构优化使得生产要素流向高生产率部门,在此过程中产生的结构红利有助于本地经济不断调整优化,从而对危机做出更为积极的反应。此外,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背景下,地方政府的税收竞争必然带来地区技术进步,进而改进企业生产方式。在产业升级与技术进步的协同驱动下,地区经济韧性将向更高层次演进。

根据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说1:地方政府加大税收竞争力度能够提升本地区的经济韧性。

2. 税收竞争影响经济韧性的路径

由于税收竞争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都具有影响,而且经济韧性也是经济发展各方面综合的结果,税收竞争对经济韧性的影响存在多条路径。对此,本文在借鉴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主要从要素流动、产业发展和创新能力3个方面进行分析。

(1) 税收竞争、要素流入与经济韧性。地方政府往往会通过税收竞争来争夺流动性要素,当地方政府实施税收优惠或给予财政补贴时,外部要素在逐利性的驱使下会流入本辖区(王文甫等,2022)^[14],要素流入使得外部冲击所引发的地区要素紧缺得以缓解。从长期来看,要素流入会增强当地的资源禀赋优势,利用这些要素可以发展壮大优势产业,培育本地区的经济优势。同时,要素的流入和集聚还会改变地区要素结构,影响地区比较优势并诱发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进而提升地区经济韧性,具体表现在:一是产生规模经济 and 专业化分工,提高专业技能和技能的匹配性,降低交易成本,从而优化要素配置效率;二是形成要素的匹配、共享和学习效应,提高区域整体的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董直庆等,2018)^[25];

三是提升技术和生产的多样性,加速产业间和产业内的知识技术溢出,促进新知识的创造和知识交换,异质性技能的相互作用促使技能分割和集聚,技术多样性提高资源利用和产品使用的深度与广度,进而深化产业的分化与融合,提高地区经济的稳定性(梁琦等,2014)^[26]。

(2) 税收竞争、产业多样化与经济韧性。作为政府调整产业结构的重要手段,税收政策通过产量效应与替代效应对产业结构变化发挥作用(储德银等,2014)^[27],具体来讲:差异化的税率以及税收优惠导致不同行业、规模企业间的税负水平存在差异,从而可以有针对性地调节产业结构;同时,地方政府通过调整税制结构还可以对投资结构、消费结构和资源配置等进行引导和调控。伴随着我国经济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为着力破解发展瓶颈,地方政府结合其发展目标通过结构性减税展开税收竞争,一方面助力主导产业和优势产业的形成和发展,另一方面积极延伸产业链和壮大产业集群,发展新兴产业部门,改变产业结构单一的局面,形成产业多样化发展态势。一个经济系统在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演进的过程中,产业结构多样化是抵抗外部环境冲击、促进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原因(徐圆等,2019)^[4]。在经济遭受外部冲击时,多样化的产业结构有助于消除过于依赖某一产业的弊端,降低经济发展的不稳定性,分散冲击带来的风险,减少整体经济损失。当经济开始复苏时,多样化的产业结构则会形成产业间的劳动力共享、知识溢出和产业关联,实现知识重组,推进整体技术进步。因此,税收竞争可以通过促进产业多样化促使经济系统在受到冲击后能够更快更好地进行适应性产业结构调整,实现进入新发展阶段的经济转型,并获得持续的经济韧性。

(3) 税收竞争、创新能力与经济韧性。技术水平决定经济增长的长期均衡路径,技术创新作为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和发展方式转变的内在驱动力,对于经济韧性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随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深入推进,“为创新而竞争”已成为地方政府决策重要的考量因素(卞元超等,2017)^[28],而税收竞争能够通过吸引创新要素来提升创新能力和水平。随着地方政府将竞争目标转向新兴产业与高技术产业,科技产业园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大量税收优惠政策降低了高科技企业的实际税收负担,企业创新发展的环境不断改善,并通过并购、子公司设立等方式促进创新要素跨区流动(王欣亮等,2021)^[19]。这些创新要素具有较强的技术溢出效应,推动企业生产要素高端化和现代化,形成深度专业化分工,改进生产模式,优化资源配置,在降低资源消耗的同时提高产品附加值,提升生产效率和经济韧性(程广斌等,2022)^[7]。同时,税收竞争可以通过提高创新投入来提升创新能力。研发活动是一种高风险的投资行为,并具有较强的正外部性,这使得创新的私人成本大于社会成本,降低了企业从事研发活动的积极性(陈红等,2019)^[29]。实际税负的降低能够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降低研发活动的成本和风险,而企业为尽可能获取税收优惠,也会将更多资源投入研发活动中,从而形成良性循环。技术创新能通过重构产业链、价值链不断催生新产品、新模式和新业态;在遭遇外部冲击后,创新能力较强的地区也更容易更快地找到新的发展路径来适应环境变化。

综上所述,可以得到以下结论:首先,税收竞争降低了地区宏观税负,促使外部生产要素在逐利性的驱使下流入本地区,不仅可以缓解外部冲击所引发的生产要素紧缺,还可以形成要素集聚,进而通过规模经济效应、专业化分工效应、知识溢出效应等完善地区产业体系,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提升经济韧性。其次,地方政府通过结构性减税调节不同产业的宏观税负水平,在发展壮大优势产业的同时延伸产业链、形成产业集群、培育新兴产业,促进产业多样化发展,而产业多样化是抵抗外部冲击、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因素。最后,税收竞争还可以通过吸引创新要素集聚、增加创新投入等不断提升本地创新能力和水平,优化经济发展模式,形成新的长期发展路径,从而持续提升地区经济韧性。

根据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说2:地方政府加大税收竞争力度能够通过吸引要素流入、促进产业多样

化、提高创新能力等路径来提升地区经济韧性。

3. 税收竞争影响经济韧性的异质性

上述理论分析表明,地方政府税收竞争会促进地区经济韧性的提升。然而,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市场化程度、制度环境等各有不同,从而地区经济韧性本身存在显著差异,同时,不同地区的资源禀赋以及税收竞争策略也存在显著差异,这会导致税收竞争对经济韧性的影响表现出多样化的异质性。对此,本文主要进行以下3方面的分析:

首先,从地区经济发展状态来看,产业结构不仅反映了地区资源禀赋状况并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紧密相关,而且具有持续升级的共同的演变趋势,因而在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地方政府税收竞争对地区经济韧性的影响也可能发生变化。工业化和服务化是产业结构随着经济发展不断升级的总体趋势,当在产业结构水平较低时,农业占比相对较大,工业化和城镇化程度较低,产业基础薄弱,技术水平不足,由于缺乏相应的配套设施和服务,地方政府的税收竞争较难吸引高端要素(如高素质的劳动力、先进的技术、高质量的投资等)流入,能够带来的要素集聚、产业多样化、技术溢出等积极效应相对有限,对地区经济韧性的提升作用也较小。尤其是在后发地区的工业化过程中,税收竞争可能导致大量低效率、高污染的制造企业涌入,造成生产低效率、高耗能、高污染等问题(李子豪等,2018)^[22],由此引致的拥挤效应还可能对经济韧性的提升产生消极影响。而在产业结构水平较高时,高技术产业和服务业占比较高,诸如交通运输业、仓储业、金融业、保险业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带来便利的交通和物流,提高了要素的流动性和资源配置效率,并产生需求拉动效应和产业转移效应(朱德云等,2023)^[30]。此时地方政府进行税收竞争更容易吸引高端要素流入,形成高端产业集聚和先进技术溢出效应;同时,地方政府也有动机和充裕的资金去支持新兴产业发展和研发创新活动,从而吸引更多创新要素流入并引导其流向新兴产业,加快产业高级化和多样化发展(宋晓玲等,2022)^[31]。因此,随着地区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地方政府税收竞争对地区经济韧性的提升作用也逐渐增强。

其次,从地方政府的税收竞争本身来看,并非力度越大越好。当地方政府的税收竞争力度较小时,加大税收竞争力度可以对要素流入产生较大的吸引力,从而带来一系列积极的经济效应;而当税收竞争力度已经较大时,再加大税收竞争力度,一方面对要素流入吸引力的增强效应减弱,另一方面也可能导致要素过度集聚产生拥挤效应。合理的税收竞争有助于经济韧性的提升,但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充当“守夜人”角色的政府如果进行过度且逐底的税收竞争,过度干预产业发展,则会带来辖区内重复建设、投资过热、环境污染等问题(周业安等,2009;于海峰,2008;李子豪等,2018)^{[11][21][22]},进而扭曲资源配置,并给地方财政带来较大压力,最终导致地区公共品供给不足,不利于投资环境的改善并弱化各产业部门风险应对能力与适应能力,阻碍地区经济韧性的提升。因此,适度的税收竞争将显著提升经济韧性,形成“趋优竞争”;而税收竞争过度则会扭曲资源配置,最终不利于地区经济韧性的提升。

最后,从空间差异来看,由于我国经济发展从东到西的梯度结构显著,地方政府税收竞争对地区经济韧性的影响可能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异质性。总体来看,东部地区经济基础条件较好,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营商环境也较为完善,地方政府降低税负的税收竞争能够进一步吸引高端要素流入;同时,较为完备的产业体系和规模优势可以吸引更多高技术企业和新兴产业入驻,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多样化发展;此外,雄厚的地方财力和发达的金融服务体系也为企业创新提供了有力支持,进而推动创新能力快速提升。而在西部地区,由于区位条件较差,产业基础薄弱,可能缺乏充足的财政资金来维持税收竞争,即便展开税收竞争,对高端要素的吸引力不如东部地区,所形成的产业集聚也多为价值链低端产业,难以对

地区经济韧性的提升产生显著影响。

根据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说3:随着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税收竞争的经济韧性提升效应不断增强;地方政府的税收竞争力度较小时,加大税收竞争力度具有更强的经济韧性提升效应;税收竞争的经济韧性提升效应具有从东到西逐渐减弱的区域异质性。

三、14个城市群的经济韧性测度

2018年11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提出:要建立以中心城市引领城市群发展、城市群带动区域发展新模式,推动区域板块之间融合互动发展。作为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城市群发展是未来经济韧性构建和提升关键之所在,对城市群经济韧性展开深入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本文选取国务院批复的国家级城市群和“十四五”规划纲要中提出要优化提升、发展壮大的城市群(共14个)中的183个城市作为研究样本,对其经济韧性进行测度。同时,由于部分指标的统计数据截至2019年,选择以2005—2019年作为样本考察期。

现有文献测度地区(城市)经济韧性的方法主要包括指标体系法和敏感系数法。敏感系数法通过冲击前后某单项指标随时间持续变化的过程来进行测度,一般选择就业率、GDP增长率等作为衡量指标,其受限于指标的单一性,难以全面衡量经济韧性,可能造成测度结果的偏误。而通过建立评价指标体系进行经济韧性测度,能较为全方面地反映经济韧性,并克服单一指标衡量经济韧性存在的缺陷。参考Martin(2010)对于经济韧性概念的定义^[2],本文从三个维度进行城市经济韧性评价:一是抵御力,即城市经济系统抵抗并吸收外界冲击扰动的能力,主要包括影响经济稳定性(如就业、物价、国际收支平衡等)、经济系统风险(如收入差距、房地产泡沫风险、贸易压力、金融风险等)以及经济发展基础等方面的因素。二是恢复与适应力,即城市经济系统在受到冲击后重新调整自身结构适应新的外部环境并维持经济稳定增长的能力,不仅体现在经济增长上,还体现在增长方式以及公共服务水平上。三是转型力,即城市经济系统在产业转型和技术进步的驱动下,为构建新的发展模式和路径而改变原有结构从而实现经济转型与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主要体现在技术创新能力和水平、人力资本积累以及绿色转型等方面。以抵抗力、恢复与适应力、转型力作为准则层,借鉴朱金鹤和孙红雪(2021)的研究^[8],并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选取27个指标来评价样本城市的经济韧性,如表1所示。

首先,对各指标进行非负和标准化处理。为避免标准化值出现负值,同时区分正向指标和逆向指标,采用极值法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然后,借鉴张秀艳等(2021)的方法^[33],采取熵值法计算各指标权重(结果见表1)。最后,对各指标进行加权求和,计算得到经济韧性综合指数,指数越大则城市经济韧性越强。根据城市群经济韧性综合指数测度结果,绘制14个城市群经济韧性的演变趋势如图1所示。从空间特征来看,不同城市群的经济韧性存在显著差异,呈现梯度分布,大体可分为三个层级:“粤港澳大湾区”和“长三角城市群”的经济韧性明显高于其余城市群,位于第一层级;“山东半岛城市群”“粤闽浙沿海城市群”和“京津冀城市群”的经济韧性超过0.4,位于第二层级;其余城市群经济韧性明显偏低,位于第三层级。从变化趋势来看,14个城市群的经济韧性在考察期内均呈现出波动上升趋势,同时城市群之间的差距也趋于扩大。处于第一、第二层级的东部五大城市群经济韧性提升幅度较大,均超过或接近70%;“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中原城市群”的经济韧性也得到了明显提升;而“哈长城市群”和“辽中南城市群”的经济韧性提升幅度较小,仅提升了约40%。可见,作为重工业基地的东北地区,存在经济结构单一、创新力不足、陷入功能性锁定等问题,影响到其城市群的高质量发展。

表 1 城市经济韧性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	准则层	具体指标	属性	指标测度方法	权重
城市 经济 韧性	抵抗力 (0.189 3)	经济发展水平	正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0.066 0
		城乡收入差距	负	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	0.011 6
		对外贸易依存度	负	进出口总额/GDP 总额	0.006 2
		金融风险	负	年末金融机构贷款/年末金融机构存款	0.018 3
		失业水平	负	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城镇单位从业人数	0.010 3
		失业保险参保水平	正	失业保险参保人数/城镇单位从业人数	0.030 6
		旅游业依存度	负	旅游业收入/GDP 总额	0.007 8
		房价水平	负	年均商品房销售价格/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	0.008 1
		房价增长率	负	年均商品房销售价格的增长率	0.010 9
		物价变动	负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0.019 7
	恢复与适应力 (0.335 8)	经济增长	正	GDP 增长率	0.019 6
		房地产投资水平	负	房地产投资额/GDP	0.013 0
		消费能力	正	社会消费零售总额/GDP	0.022 8
		采掘业依存度	负	采矿业从业人数/城镇单位从业人数	0.007 4
		户籍人口增长	正	年末户籍人口/年初户籍人口-1	0.013 4
		公路密度	正	城市公路里程/行政区面积	0.028 8
		医疗保障水平	正	执业医师数/常住人口	0.034 4
		人均财政支出	正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常住人口	0.064 9
		财政教育投入	正	教育支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0.026 6
		互联网用户比例	正	互联网宽带用户数量/常住人口	0.065 0
	移动电话用户比例	正	移动电话用户/常住人口	0.039 9	
	转型力 (0.474 9)	科技事业人员占比	正	科学研究与技术服务业从业人数比重	0.074 1
		计算机软件服务人员占比	正	计算机软件服务业从业人数比重	0.076 1
		每万人专利授权数	正	专利授权数/常住人口	0.180 3
		财政科技投入	正	财政科技支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0.082 3
		单位 GDP 碳排放	负	碳排放量/GDP ¹	0.008 7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正	采用含非期望产出的 SBM 模型测算 ²	0.053 4

注:1. 碳排放量根据用电量、液化石油气及天然气使用量、城市供热量进行换算,数据口径为市辖区。2. 投入变量为单位从业人数、资本存量、全社会用电量,期望产出变量为剔除价格变动的当年 GDP,非期望产出变量为污染物排放量(根据城市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工业粉尘排放量、工业废水排放量 3 个指标通过熵权法进行测算)。其中,资本存量的计算借鉴张军等(2004)的方法^[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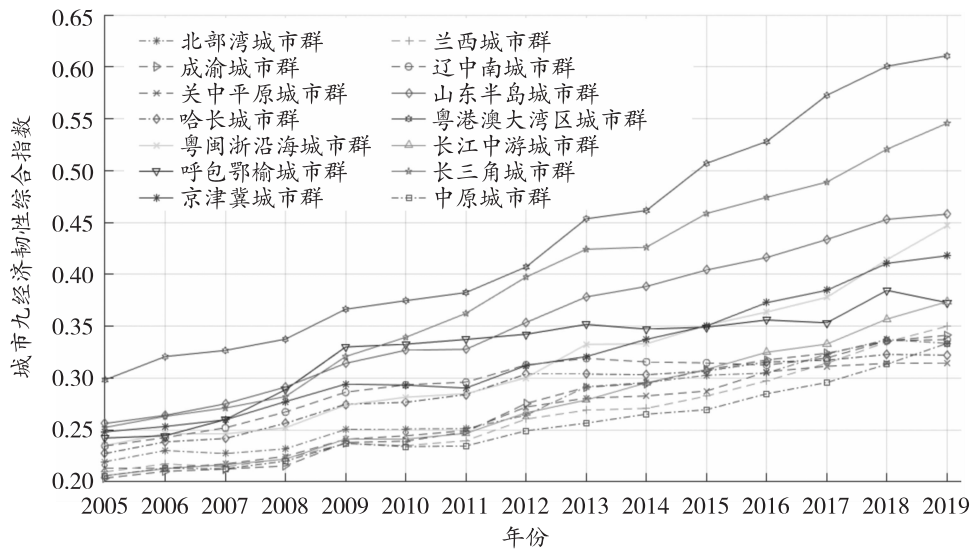


图1 2005—2019年14个城市群的经济韧性综合指数演变趋势

四、实证方法设计

1. 基准模型构建

为检验税收竞争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参考朱金鹤和孙红雪(2021)的研究^[8],构建如下面板固定效应模型:

$$Resilience_{it} = \beta_0 + \beta_1 Tax_{it} + \beta_2 X_{it} + \alpha_i + \delta_t + \varepsilon_{it}$$

其中, i 和 t 分别代表城市和年份,被解释变量($Resilience$)为“经济韧性”,解释变量(Tax)为“税收竞争”, X 为一系列控制变量, α_i 和 δ_t 分别表示个体(城市)固定效应和时间(年份)固定效应, ε_{it} 为随机扰动项。

被解释变量“经济韧性”通过前述方法计算得到。核心解释变量“税收竞争”的测度,借鉴肖叶和刘小兵(2018)的方法^[16],使用如下公式计算: $Tax_{it} = \frac{Revenue_t / GDP_t}{Revenue_{it} / GDP_{it}}$ 。其中, $Revenue_t$ 为 t 年全国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实际税收收入总和, GDP_t 为 t 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 $Revenue_t / GDP_t$ 反映了 t 年全国总体平均实际税率。因此,“税收竞争”表示全国所有地区平均实际税率与样本城市实际税率之比,其值越大则该城市的相对税率越低,地方政府的税收竞争力度越大。

参考相关文献(卢现祥等,2023;孔令池等,2017;王凤荣等,2015;邱冬阳等,2023)的研究结论^{[9][15][18][34]},选取以下控制变量:一是“对外开放度”,采用FDI(按照当年汇率折算为人民币)占GDP的比重来衡量。二是“交通基础设施”,采用每千人拥有公交汽车数来衡量。三是“经济增长目标”,数据来自样本城市的政府工作报告(若经济增长目标为区间形式则取中间值)。四是“城镇化水平”,采用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来衡量。

2. 中介效应模型构建

为检验在税收竞争影响经济韧性过程中可能存在的作用路径,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构建如下中介

效应模型:

$$M = \beta_0 + \beta_1 Tax_{it} + \beta_2 X_{it} + \alpha_i + \delta_t + \varepsilon_{it}$$

$$Resilience_{it} = \gamma_0 + \gamma_1 Tax_{it} + \gamma_2 M_{it} + \gamma_3 X_{it} + \alpha_i + \delta_t + \varepsilon_{it}$$

其中, M 为中介变量。根据理论分析,选取以下4个中介变量:一是“劳动力流入”,借鉴杨建军和李勇辉(2016)的做法^[35],采用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的差值除以户籍人口来衡量。二是“资本流入”,借鉴胡志勇等(2013)的做法^[36],采用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来衡量。三是“创新能力”,借鉴相关研究(朱金鹤等,2021;寇宗来等,2017)^{[8][37]},采用《中国城市和产业创新力报告》中的城市创新指数(取自然对数)来衡量(2017—2019年的数据以历年平均增长速度进行估算),数值越大城市创新能力越强。四是“产业多样化”,借鉴徐圆和张林玲(2019)的做法^[4],采用熵指数进行测度,即各产业(具体为《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的19个细分行业)就业比例与其自然对数乘积的负总和,指标值越大则产业多样化程度越高。

3. 异质性分析方法

为检验税收竞争的经济韧性提升效应是否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而不断增强,借鉴相关研究(肖叶等,2018;朱德云等,2023)^{[16][30]},采用以“产业结构升级”为门槛变量的门槛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构建如下面板门槛回归模型:

$$Resilience_{it} = \beta_0 + \theta_1 Tax_{it} I(Struc \leq \gamma_1) + \theta_2 Tax_{it} I(\gamma_1 < Struc \leq \gamma_2) + \theta_3 Tax_{it} I(Struc > \gamma_2) + \beta_1 X_{it} + \alpha_i + \delta_t + \varepsilon_{it}$$

其中,门槛变量($Struc$)为“产业结构升级”,借鉴孔令池等(2017)的研究方法^[15],用产业结构层次系数进行衡量,即对一、二、三次产业的产值比重进行加权求和(权重分别为1、2、3),其值越大则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越高。

为检验税收竞争力度和区域异质性,本文采用分组检验的方法,对样本进行如下分组:一是根据“税收竞争”的中位数将样本划分为“税收竞争力度大”和“税收竞争力度小”两组,二是将样本城市群划分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三组^①。

4.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采用2005—2019年14个城市群183个城市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分析所用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CEIC数据库、EPS数据库、CNRDS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以及各地的统计年鉴、统计公报、政府工作报告、政府预算文件等,缺失值采用插值法补齐。为控制异常值的影响,对控制变量进行前后1%分位的缩尾处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2。

表2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 量	观测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经济韧性	2 745	0.306	0.105	0.155	0.833
核心解释变量 税收竞争	2 745	1.926	0.874	0.430	6.690

① 东部地区包括“京津冀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城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粤闽浙沿海城市群”“辽中南城市群”,中部地区包括“中原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哈长城市群”,西部地区包括“呼包鄂榆城市群”“北部湾城市群”“关中平原城市群”“兰西城市群”“成渝城市群”。

续表 2

	变 量	观测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中介变量	劳动力流入	2 745	0.034	0.268	-0.284	1.880
	资本流入	2 745	3.078	2.393	0.111	16.863
	产业多样化	2 745	2.196	0.262	1.097	2.655
	创新能力	2 745	0.782	2.044	-5.272	7.726
门槛变量	产业结构升级	2 745	2.273	0.148	1.884	2.832
控制变量	对外开放度	2 745	0.022	0.020	0.000	0.096
	交通基础设施	2 745	0.827	0.531	0.099	2.924
	城镇化水平	2 745	0.522	0.153	0.228	0.921
	经济增长目标	2 745	0.108	0.028	0.055	0.200

五、实证结果分析

1. 基准模型分析与稳健性检验

基准模型的回归结果见表 3,(1)(2)列以经济韧性的综合指数为被解释变量,(3)(4)(5)列分别以抵抗力、恢复与适应力、转型力 3 个分指数为被解释变量。“税收竞争”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加大税收竞争力度有利于城市经济韧性的提升,假说 1 得到验证。为缓解模型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采用两种方式进行处理:一是控制城市与年份的交互固定效应,以降低遗漏变量带来的内生性;二是选择“税收竞争”的滞后一期和二期作为“税收竞争”的工具变量,采用 2SLS 方法进行估计。检验结果如表 4 所示,“税收竞争”的回归系数依旧在 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

表 3 基准模型回归结果

变 量	(1)	(2)	(3)	(4)	(5)
	经济韧性	经济韧性	抵抗力	恢复与适应力	转型力
税收竞争	0.019 4*** (4.94)	0.017 6*** (4.84)	0.020 4*** (5.29)	0.006 7** (2.36)	0.024 1*** (4.81)
经济开放度		-0.567 6*** (-3.81)	-0.577 5*** (-4.84)	-0.316 8*** (-3.37)	-0.741 0*** (-3.27)
经济增长目标		0.338 6*** (5.14)	0.173 2* (1.79)	0.187 6*** (4.15)	0.511 2*** (5.08)
交通基础设施		0.009 5* (1.77)	0.009 9* (1.89)	0.007 3** (2.00)	0.010 9 (1.31)
城镇化水平		-0.104 1* (-1.89)	-0.081 4 (-1.50)	0.033 7 (0.78)	-0.210 6** (-2.52)
常数项	0.268 8*** (33.54)	0.294 9*** (9.47)	0.452 7*** (14.30)	0.326 2*** (12.80)	0.209 9*** (4.72)
城市和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2 745	2 745	2 745	2 745	2 745
R ²	0.892 8	0.900 9	0.866 6	0.943 4	0.843 0

注:***、**、*分别表示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稳健 t 值,下表同。

表 4 内生性处理结果

变 量	控制交互固定效应	IV-2SLS 回归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税收竞争	0.005 9*** (5.67)		0.025 8*** (3.27)
L1. 税收竞争		0.484 9*** (11.28)	
L2. 税收竞争		0.128 0*** (4.86)	
常数项	0.305 3*** (30.71)	0.8844*** (5.21)	0.172 9*** (4.29)
控制变量和双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与年份交互固定效应	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样本量	2 745	2 379	2 379
R ²		0.882 9	0.721 8

注:工具变量法的 Kleibergen-Paap rk LM 统计量为 44.84(p 值为 0.00),Kleibergen-Paap rk Wald F 统计量为 184.45(10%显著水平的临界值为 19.93)。

进一步采用以下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1)变换估计模型。在基准模型回归中为消除异方差及自相关带来的影响,使用聚类到个体的稳健标准误,为进一步减轻自相关带来的影响,采用解决组内自相关问题的 FGLS 模型进行检验,并使用 LSDV 法控制固定效应。(2)更换解释变量。前文通过宏观税负(地方税收收入占 GDP 的比重)来测算样本城市的税收竞争力度,低税率或者零税率的第一产业也纳入测算范围,但实际上第一产业较少涉及税收竞争,因此借鉴魏志华和卢沛(2021)的做法^[38],使用第二和第三产业增加值替代 GDP,重新测算“税收竞争”变量并进行模型估计。(3)剔除特殊样本。剔除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和省会城市样本,重新进行模型回归。(4)数据缩尾处理。为避免极端值造成回归结果偏差,对被解释变量和核心解释变量进行 1%的缩尾处理,重新进行模型回归。上述稳健性检验的结果见表 5,“税收竞争”的估计系数依然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进一步表明本文的分析结果具有良好的稳健性。

表 5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 量	FGLS 回归	更换解释变量	剔除特殊样本	数据缩尾处理
税收竞争	0.008 7*** (3.95)	0.017 2*** (3.91)	0.011 9*** (3.76)	0.019 1*** (4.71)
常数项	0.169 6*** (14.31)	0.303 6*** (9.62)	0.250 1*** (10.44)	0.278 3*** (9.74)
控制变量和双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2 745	2 745	2 310	2 745
R ²	0.798 3	0.899 8	0.888 7	0.905 4

2. 中介效应检验

运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的结果见表6。“税收竞争”对“劳动力流入”“资本流入”“产业多元化”“创新能力”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地方政府加大税收竞争力度可以促使更多的劳动力和资本流入本地,并促进本地产业多样化和创新能力提升;“劳动力流入”“资本流入”“产业多元化”“创新能力”对“经济韧性”的估计系数也均显著为正,表明要素流入、产业多样化发展和创新能力提高都有利于城市经济韧性的提升。进一步从估计系数的比较来看,4个中介变量均具有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且Sobel检验均拒绝原假设。上述结果表明,税收竞争可以通过吸引劳动力和资本要素流入、促进产业多样化发展、提高城市创新能力3条路径来提升城市经济韧性,假说2得到验证。

表6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变 量	基准模型	劳动力流入路径		资本流入路径		产业多样化路径		创新能力路径	
	经济韧性	劳动力流入	经济韧性	资本流入	经济韧性	产业多样化	经济韧性	创新能力	经济韧性
税收竞争	0.017 6*** (4.84)	0.018 4*** (4.44)	0.014 4*** (4.14)	0.409 0*** (3.99)	0.014 5*** (4.25)	0.009 7** (2.25)	0.017 0*** (4.71)	0.117 4** (2.30)	0.014 1*** (4.21)
劳动力流入			0.169 4*** (3.55)						
资本流入					0.007 4*** (5.41)				
产业多样化							0.062 2*** (2.84)		
创新能力									0.029 2*** (6.43)
常数项	0.286 6*** (9.17)	1.081 6*** (35.18)	0.105 6 (1.61)	-0.292 3 (-0.23)	0.288 8*** (8.87)	2.384 2*** (65.25)	0.136 3** (2.41)	-0.092 6 (-0.22)	0.289 3*** (9.43)
Sobel Z		0.003 1*** (6.76)		0.003 0*** (6.26)		0.000 6** (2.05)		0.003 4*** (5.64)	
中介效应占比		17.74%		17.12%		3.45%		19.49%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2 745	2 745	2 745	2 745	2 745	2 745	2 745	2 745	2 745
R ²	0.900 9	0.979 2	0.904 8	0.802 0	0.906 5	0.889 6	0.903 6	0.966 7	0.911 7

3. 异质性分析

本文以“产业结构升级”为门槛变量,采用门槛效应模型检验在不同的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下税收竞争对经济韧性的影响。首先进行门槛个数检验和门槛值估计(bootstrap 次数为 300 次),结果显示存在双重门槛(见表 7),再进行门槛效应检验,回归结果如表 8 所示。在区间 I(“产业结构升级” ≤ 2.4004),“税收竞争”对“经济韧性”的回归系数为负但不显著;在区间 II($2.4004 < \text{“产业结构升级”} \leq 2.5698$),回归系数为 0.0246,并在 1%的水平上显著;在区间 III(产业结构水平 > 2.5698),回归系数为 0.1239,并在 1%的水平上显著。可见,随着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地方政府税收竞争对地区经济韧性提升的促进效应也不断增强。

表 7 门槛检验结果

门槛变量	门槛类型	门槛值	95%置信区间	F 统计量	P 值	检验结果
产业结构升级	单一门槛	2.4004	[2.3975, 2.4026]	220.69	0.000	拒绝原假设
	双重门槛	2.5698	[2.5381, 2.5734]	133.79	0.000	拒绝原假设
	三重门槛	2.4739	—	106.81	0.690	接受原假设

表 8 门槛效应检验结果

变 量	经济韧性
税收竞争(产业结构水平 ≤ 2.4004)	-0.0020 (-0.61)
税收竞争($2.4004 < \text{产业结构水平} \leq 2.5698$)	0.0246*** (3.97)
税收竞争(产业结构水平 > 2.5698)	0.1239*** (4.56)
常数项	0.1071*** (2.95)
控制变量和双固定效应	控制
样本量	2745
R ²	0.6946

基于税收竞争力度高低的分组检验结果显示(见表 9),“税收竞争”对“经济韧性”的回归系数,在“税收竞争力度小”样本中显著为正,而在“税收竞争力度大”样本中不显著。可见,当地方政府本来的税收竞争力度较小时,加大税收竞争力度可以显著促进经济韧性提升;而当地方政府本来的税收竞争力度较大时,进一步加大税收竞争力度并不能显著促进经济韧性的提升。对三大区域的分组检验结果显示(见表 9),“税收竞争”对“经济韧性”的回归系数,在“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样本中显著为正,而在“西部地区”样本中不显著,从回归系数的大小来看,税收竞争对经济韧性的影响在东、中、西部地区依次递减。可见,地方政府税收竞争对地区经济韧性的促进作用具有从东到西逐渐减小的区域异质性。

至此,假说 3 得到验证。

表9 异质性分析结果

变 量	税收竞争力度异质性		区域异质性		
	税收竞争力度小	税收竞争力度大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税收竞争	0.048 1*** (3.48)	0.002 5 (1.03)	0.047 0*** (4.87)	0.010 4*** (3.03)	0.003 0 (0.70)
常数项	0.287 6*** (5.66)	0.255 2*** (12.04)	0.162 1** (2.45)	0.227 7*** (9.26)	0.297 4*** (11.94)
控制变量和双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1 359	1 365	1 095	9 75	6 75
R ²	0.911 2	0.910 2	0.908 5	0.893 6	0.898 5

六、结论与启示

随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地方政府竞争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不容忽视,需要不断规范和改善地方政府竞争行为以形成“趋优竞争”格局。税收竞争是地方政府竞争的主要内容,其对地区经济发展具有积极影响,也会带来一些负面效应,因而如何更好地发挥其积极效应、弱化其消极影响是值得研究的课题。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持续提升经济韧性,深入探究地方政府税收竞争对地区经济韧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有助于充分发挥“有为政府”推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作用。本文基于“抵抗力”“恢复与适应力”“转型力”3个维度构建城市经济韧性的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2005—2019年14个城市群183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税收竞争对经济韧性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1)14个城市群的经济韧性在考察期内均呈现出波动上升趋势,且东部地区城市群的增长速度明显快于中西部地区城市群,导致城市群之间的经济韧性差距趋于扩大。(2)地方政府税收竞争显著促进了地区经济韧性提升,并存在吸引要素流入、促进产业多样化、提高创新能力3条影响路径。(3)随着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地方政府税收竞争对地区经济韧性的促进效应不断增强;当税收竞争力度较小时加大税收竞争力度具有显著的经济韧性提升效应,而当税收竞争力度较大时加大税收竞争力度对经济韧性的影响不显著;在东部和中部地区地方政府税收竞争对地区经济韧性的提升作用显著,而在西部地区税收竞争对经济韧性的影响不显著,总体上表现出经济韧性提升效应从东到西逐渐减弱的区域异质性。

基于上述结论,得出以下启示:第一,要理性对待和有效发挥地方政府税收竞争的激励效应。尽管税收竞争对经济韧性提升的促进作用显著,但过度的税收竞争并无益于经济韧性提升,因此需要控制地方政府的税收竞争力度,使其保持在合理的区间内。各地应根据自身产业基础及资源禀赋采取差异化的税收竞争策略,制定与产业结构升级相匹配的税收优惠政策,吸引与本地产业发展相匹配的高端要素流入,促进产业集聚和多样化发展,推动创新能力持续提升。第二,要通过完善绩效考核机制不断改善地方政府的税收竞争行为。在“更具韧性”的战略导向下打破“唯GDP论”的考核制度,构建多元化的地方政府考核指标体系,注重可持续发展、经济韧性等长期目标,促使地方政府在税收竞争中积极构建更具韧性的经济和社会系统。第三,要建立和完善区域间协调有序的产业转移和升级机制。东部发达地区应继续发挥现有优势,加大支持科技创新和高端产业发展的税收优惠力度,着力发展高新技术,率先实现产业数字化转型,形成区域发展的示范效应。同时,应加大对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专项转移支付力

度,促进其基础设施完善和公共服务均等化,增强其对高端要素的吸引力,进而有效发挥税收竞争的积极效应。此外,要进一步发挥城市群和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优先发展中心城市的先进制造业和高端服务业,再向周边城市开拓相关产业和上下游配套产业,加快城市群内部和城市群之间的产业链分工体系升级。

本文探讨了地方政府税收竞争对地区经济韧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取得了有价值的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但还可以进一步拓展与深化:一方面,税收竞争往往伴随着地方政府之间的策略互动以及税负在空间和时间上的转嫁,未来还需针对税收竞争存在的空间效应及长期效应展开深入研究;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税收竞争存在“最优度”的问题,未来还需针对税收竞争的“最优区间”展开进一步研究,为地方政府的税收竞争策略提供更有价值的决策参考。

参考文献:

- [1] REGGIANI A, GRAAFF T D, NIJKAMP P. Resilience: an evolutionary approach to spatial economic systems [J]. *Networks and Spatial Economics*, 2002, 2(2): 211-229.
- [2] MARTIN R. Regional economic resilience, hysteresis and recessionary shocks [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12 (12): 1-32.
- [3] 孙久文,孙翔宇. 区域经济韧性研究进展和在中国应用的探索[J]. *经济地理*, 2017, 37(10): 1-9.
- [4] 徐圆,张林玲. 中国城市的经济韧性及由来:产业结构多样化视角[J]. *财贸经济*, 2019, 40(7): 110-126.
- [5] 赵春燕,王世平. 经济集聚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J].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21(1): 102-114.
- [6] 张跃胜,张寅雪,邓帅艳. 技术创新、产业结构与城市经济韧性——来自全国 278 个地级市的经验考察[J]. *南开经济研究*, 2022(12): 150-168.
- [7] 程广斌,靳瑶. 创新能力提升是否能够增强城市经济韧性? [J]. *现代经济探讨*, 2022(2): 1-11+32.
- [8] 朱金鹤,孙红雪. 数字经济是否提升了城市经济韧性? [J]. *现代经济探讨*, 2021(10): 1-13.
- [9] 卢现祥,许诚,张峰. 撤县设区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研究[J]. *财政研究*, 2023(3): 63-77.
- [10] 常哲仁,韩峰,钟李隽仁. 创新试点政策能够提高城市经济韧性吗? ——来自准自然实验的证据[J]. *经济问题*, 2023(4): 105-112.
- [11] 周业安,宋紫峰. 中国地方政府竞争 30 年[J]. *教学与研究*, 2009(11): 28-36.
- [12] 李涛,黄纯纯,周业安. 税收、税收竞争与中国经济增长[J]. *世界经济*, 2011, 34(4): 22-41.
- [13] 张福进,罗振华,张铭洪. 税收竞争与经济增长门槛假说——基于中国经验数据的分析[J]. *当代财经*, 2014(6): 32-42.
- [14] 王文甫,张彤. 税收竞争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J]. *财贸研究*, 2022, 33(9): 57-66.
- [15] 孔令池,高波,李言. 市场开放、地方财税竞争与产业结构调整——基于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17(10): 45-57.
- [16] 肖叶,刘小兵. 税收竞争促进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吗? ——基于总量与结构双重视角[J]. *财政研究*, 2018(5): 60-74+45.
- [17] 唐飞鹏,叶柳儿. 税收竞争、资本用脚投票与产业转型升级[J]. *财贸经济*, 2020, 41(11): 20-34.
- [18] 王凤荣,苗妙. 税收竞争、区域环境与资本跨区域流动——基于企业异地并购视角的实证研究[J]. *经济研究*, 2015, 50(2): 16-30.
- [19] 王欣亮,汪晓燕,刘飞. 税收竞争有利于提升区域创新绩效吗? ——基于创新要素流动的空间机制分析[J]. *财贸研究*, 2021, 32(6): 98-110.
- [20] 蒋仁爱,石皓月. 创新导向下地方政府竞争对制造业升级的空间效应研究[J].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52(5): 148-158.

- [21] 于海峰. 中央政府在地方横向税收竞争中的作用机制分析[J]. 税务研究, 2008(10):38-41.
- [22] 李子豪,毛军. 地方政府税收竞争、产业结构调整与中国区域绿色发展[J]. 财贸经济, 2018, 39(12):142-157.
- [23] 管治华,许坤,许文立. 结构性减税压力下的财政支出效率提升——基于省际间财政支出超效率 DEA 模型分析[J]. 财政研究, 2016(7):35-45.
- [24] 王智烜,邓力平,吴心妮. 减税降费的就业促进效应——基于异质性企业框架视角[J]. 税务研究, 2020(10):16-20.
- [25] 董直庆,赵星. 要素流动方向、空间集聚与经济增长异地效应检验[J]. 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20(6):57-67+147.
- [26] 梁琦,黄利春. 要素集聚的产业地理效应[J]. 广东社会科学, 2014(4):5-13.
- [27] 储德银,建克成. 财政政策与产业结构调整——基于总量与结构效应双重视角的实证分析[J]. 经济学家, 2014(2):80-91.
- [28] 卞元超,白俊红. “为增长而竞争”与“为创新而竞争”——财政分权对技术创新影响的一种新解释[J]. 财政研究, 2017(10):43-53.
- [29] 陈红,张玉,刘东霞. 政府补助、税收优惠与企业创新绩效——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实证研究[J]. 南开管理评论, 2019, 22(3):187-200.
- [30] 朱德云,王鸿梓. 税收竞争与财政支出竞争对区域科技创新效率的影响——基于产业结构升级的门槛效应检验[J]. 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 2023, 43(1):86-102.
- [31] 宋晓玲,李金叶. 产业协同集聚、地方政府竞争与制造业绿色发展[J]. 经济经纬, 2022, 39(4):86-96.
- [32] 张军,吴桂英,张吉鹏. 中国省际物质资本存量估算:1952—2000[J]. 经济研究, 2004(10):35-44.
- [33] 张秀艳,白雯,郑雪. 我国区域经济韧性的关联识别与演化特征分析[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21, 61(1):90-101+237.
- [34] 邱冬阳,白玉铭. 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弹性约束与经济高质量发展[J]. 改革, 2023(5):54-73.
- [35] 杨建军,李勇辉. 劳动力流动、流动方向和城乡收入差距[J]. 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 40(6):67-71.
- [36] 胡志勇,周俊琪,傅俏. 地市级政府税收竞争与资本流动——基于福建省九个地市经济数据的研究[J]. 税务研究, 2013(12):77-80.
- [37] 寇宗来,刘学悦. 中国城市和产业创新力报告[R]. 复旦大学产业发展研究中心, 2017.
- [38] 魏志华,卢沛. 税收竞争、征税努力与企业税负粘性[J]. 经济学动态, 2021(6):49-67.

The Impact and Mechanisms of Tax Competition on Regional Economic Resilience: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183 Cities in 14 Urban Agglomerations

TIAN Shi-zhong, CHEN Hao-pe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hui University, Hefei 230031, Anhui, China)

Abstract: The tax competition mechanism of local government is regarded as an important source of China's long-term rapid economic growth. However, with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goal from high-speed growth to "steady progress", in this context, exploring the mechanism of local government tax competition on economic resilience is conducive to giving play to the important role of "promising government"

in promoting sustained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and providing policy guarantee for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Urban agglomeration is the key to the construction and improvement of China's economic resilience in the future.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183 cities in 14 urban agglomerations in China from 2005 to 2019,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three-dimensional index system of "resistance - recovery and adaptability - transformation" and uses the entropy method to measure economic resilience. The panel fixed effect model, intermediary effect model, and threshold model were used to reveal the impact of tax competition on economic resilience. The study found that: (1) the comprehensive index of economic resilience of 14 urban agglomerations showed a trend of fluctuation during the study period, but the growth rate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in the eastern region was significantly faster than that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and the economic resilience gap between urban agglomerations was widening. (2) Tax competition can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economic resilience by attracting the inflow of factors, promoting the diversified development of industries, and improving the innovation capacity of cities. (3) The high intensity of tax competition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improvement of economic resilience; tax competition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economic resilience in eastern and central regions, but not in western regions. (4) The effect of tax competition on economic resilience is enhanced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regional industrial structure.

Therefore, first of all, local governments should take the promotion of regional economic resilience as a policy focus, rationally treat and effectively play the incentive effect of tax competition, encourag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emerging industries, and build diversified industrial clusters. Second, under the strategic guidance of "more resilience", break the "GDP-only" official evaluation system and shift to the long-term goal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strengthening resilience. Finally, it is necessary to further improve the fiscal and tax benefit distribution mechanism, establish a clear and win-win industrial transfer benefit sharing system, expand and strengthen industrial cooperation demonstration zones, and form a coordinated and orderly industrial transfer and upgrading mechanism between regions, so as to promote the overall improvement of regional economic resilience. The above conclusions provide important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how fiscal and tax policies serve stable macroeconomic growth and promote the formation of regional economic layouts with complementary advantages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normal.

Key words: tax competition; economic resilience; urban agglomerations; factor flow; industrial diversification; ability to innovate;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CLC number: F812.42; F207

Document code: A

Article ID: 1674-8131(2023)04-0092-17

(编辑:刘仁芳)